

开放中的变迁

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

金观涛 刘青峰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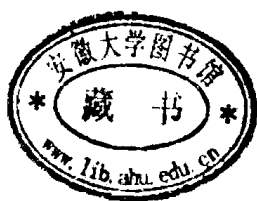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1840-1956)

The Fate of Its Ultrastable Structure in Modern Times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开放中的变迁

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



法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2010年
版/金观涛,刘青峰著.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5118-1231-5

I. ①开… II. ①金…②刘… III. ①政治思想—研
究—中国—1840~1956 IV. ①D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87657号

©法律出版社·中国

责任编辑/易明群

装帧设计/乔智炜

出版/法律出版社

编辑统筹/学术·对外出版分社

总发行/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责任印制/吕亚莉

开本/A5

印张/15 字数/352千

版本/2011年1月第1版

印次/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7号(100073)

电子邮件/info@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010-63939792/9779

网址/www.lawpress.com.cn

咨询电话/010-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7号(100073)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第一法律书店/010-63939781/9782 西安分公司/029-85388843 重庆公司/023-65382816/2908

上海公司/021-62071010/1636 北京分公司/010-62534456 深圳公司/0755-83072995

书号:ISBN 978-7-5118-1231-5 定价:46.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书与人生

——写在《兴盛与危机》(增订本)、
《开放中的变迁》再版之际

法律出版社出版这两本近二十年前在香港印行的旧作,我们意外、高兴之余,也感慨万千。我们的主要工作一直是以超稳定结构假说来分析中国社会及文化在两千多年间的演变,姑且不论对其褒贬评价,它已成为我们的学术符号。三四十年来,从我们年轻时代的思考,到1980年代热情投身于民间文化运动,再到近二十余年沉潜于学术,一直围绕着这一假说的提出、研究和不断深化,也记录着各地出版社、编辑与我们的缘分。伴随着时代变迁,是我们辗转于北京、贵州、杭州、郑州、北京,再到香港、台北的人生。熟悉的城市和景观已永远消失,当年种下的树苗已长成大树,我们亦从中青年步入老年,唯独不变的,是我们仍然在思考、研究中国社会这个超稳定系统。

1981年,我们完成《兴盛与危机》写作之后,这本书便进入当时以出书快而闻名的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漫长曲折审编过程。到1983年尚不能确知出版日期,于是,该书简写本《在历史的表像背后》便收入第一批《走向未来》丛书出版,它成为火红1980年代的畅销书之一。湖南出版《兴盛与危机》之后过了三年,1987年夏我们结束访美一年回到北京,已调至江苏人民出版社的胡凡女士再次登门,

希望我们针对该书引起的广泛讨论作出修订并重新出版。就在修订稿基本完成之时,1989年4月初我们到香港中文大学访问,此后长期留在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1992年,《兴盛与危机》增订本只能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从1984年算起,二十六年间《兴盛与危机》,该书先后出版了简—繁—简体字不同版本。细心的读者会发现,香港版《兴盛与危机》增订本的副标题,由1984年湖南版的“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改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删去了“封建”两个字。1993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开放中的变迁》是《兴盛与危机》的续篇,副标题“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中也没有“封建”二字。近十多年来,我们从事关键词研究,认为从关键词使用的变化可以追踪历史足迹,那么,我们著作的副标题中“封建”这一关键词从有到无,又蕴含着什么样的思想轨迹呢?

按学术规范,用“封建”一词指涉从秦汉到民国前的中国社会,显然不很确切。表面上看,使用术语的变化,是与我们从北京来到香港,为了与海外学术用语一致,其实并不尽然如此。因为,“封建”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用语,它饱含着几代人痛苦而复杂的思想历程。

在受共产主义革命教育成长起来一代人的语汇中,“封建”是描述中国两千年间的君主专制独裁和地主阶级剥削制度的专有名词,是中国革命要推翻、打倒的对象。当20世纪中国的不断革命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在追求解放全人类的崇高道德理想目标下,全民狂热追随伟大领袖,砸烂旧世界,彻底革命。现实生活却是几亿人互相残酷斗争,人的生命尊严扫地。“文革”发生时,我们都是北京大学学生,作为在反封建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还有什么能比“封建”的复活更触目惊心的呢?我们开始思考革命后的现代中国是否与革命力图摧毁的古代制度存在着某种关联。我们决定放弃原有专业,转入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进入幽暗漫长的历史

隧道。

1970年代初,我们已具备用超稳定系统解释中国朝代循环与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之间的关系的看法。“文革”结束,1980年,偏远的贵州师院学报上发表了我们研究的初步成果。它之所以能立刻引起广泛重视和讨论,“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问题,不正是经历了“文革”一代人的共同思考吗?在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第二次启蒙热潮中,我们写作中使用“封建”一词,把它作为反思对象,自然不会觉察到得有什么不妥。

1989年,我们来到香港中文大学后不久,就开始写《开放中的变迁》,它作为《兴盛与危机》的续篇,要解决的正是《兴盛与危机》一书隐含着尚未言明的主题。这就是中国近现代革命究竟和超稳定系统是什么关系。虽然是同一问题意识进入更深层面,但“封建”一词毕竟已失去了中国启蒙思想大背景上的位置。我们用“传统社会”代替“封建社会”,而没有用在学术上更为准确的“帝制时代”,这是因为任何纯学术的背后都存在思想的考虑。中国第二次启蒙虽然过去,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并没有完成。我们意识到,其中涉及的人文社会探索,已远超出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范围。正如“文革”终结了革命乌托邦使得现代性再次成为全人类的宿命一样,作为超稳定系统的中国传统社会演化史,有着不同于西方社会变迁的历史经验,它将为人类社会普遍历史提供新的视角。事实上,出版《开放中的变迁》并不是中国社会超稳定系统研究的终点,而是走向思想史、观念史和轴心文明比较史的起点。我们至今仍缓慢地行走在这条看不到头的探索之路上。

今天,21世纪已过去十年。而我们是20世纪的人,“文革”前曾立志献身于科学,“文革”使我们成为反思的一代。对中国历史和现状以及由这个出发点对人类处境的思考,是反思的一代的共同宿命。时光流逝,我们从启蒙大潮中心走到边缘岛屿,始终不能忘怀中国的文化建设。在这两本旧作再版之时,我们渴望能与不

开放中的变迁(2010年版)

相识的年轻读者思想交流,犹如我们回到青年时代,与南来北往的朋友彻夜促膝长谈。我们相信,每当中国发生巨变时,历史上曾经触动几代人心灵的问题,总会一再震响。

金观涛、刘青峰

2010年10月于台北木栅化南新村

第一版序

1989年8月盛夏,我们开始写作本书时已经考虑到研究和写作的艰辛了,但依然没有料到要拖到今天——1993年8月——书稿才能付印。又是一个盛夏,我们办公室窗外的青竹、门口池中的锦鲤,同四年前一样充满勃勃生机,时光却在我们埋头写作中不知不觉流逝过去。写作期间,几度春秋,数易其稿。完成这本书成为我们这几年生活的一个目标,它像隐蔽在浓雾中的一座高山,吸引着我们,令我们备尝攀山时的兴奋、疲劳,失去方向时的困惑、沮丧。今天,在我们接近目的地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喜悦,同时又有告别一个老朋友般的空虚和惆怅。

在写作过程中,始终存在表达的困难。困难不仅在于如何更准确、更概括地阐述内容,而且还在于必须照顾到一般读者和专业研究者的不同要求。为了便于阅读,本书各章均由正文和批注两部分组成:正文尽可能简明扼要地勾勒出论述主线;批注在正文中用〔 〕标出,是讨论细节或引申出来的学术问题,有关文字叙述则放在各章正文以后。本书吸收了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作为我们近代中国社会宏观变迁论点的证据和细节。这些成果多以简明的图表收入各章正文和批注。因此,本书附录中除了索引和参考文献之外,还列出全书百余个图表的目录。

任何一本书的写作,总包含着比文字所能表达的更丰富的内容。它不仅是人追求真理、实现自我生命价值的体验和经历,也包含着支持这种探索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首先,我们要说的是,如果没有香港中文大学为我们提供稳定良好的生活环境和研究条件,我们在四年中要完成这本书的研究和写作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还要感谢香港“大学及理工资助委员会”(UPGC)资助本书的打印和研究助手费用。朱英先生曾校订过本书的前四章;庆源先生认真地查核了全书引用的材料、通校全书,大大加快了本书的后期工作;李洁儿小姐近一年多来不厌其烦地录入我们写作过程中不断修改的文稿;张素芬小姐制作了本书封面;孙立川先生做了部分编校;吴江波先生安排本书制作出版;郑会欣先生作了最后的编辑工作。在此,我们谨向他们各位表示诚挚的谢意。

最后,我们要特别感谢张玉法先生和陈方正先生。今年5月,我们征得张玉法先生同意,将本书初校寄到台湾,7月下旬就收到张先生的回函。张先生在百忙中通读了三十余万字的书稿,并在史实和编辑两方面提出宝贵意见。我们在定稿时采纳了这些意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陈方正先生,作为我们的好友,四年来一直关心我们的研究、写作以及本书的出版。特别是在书稿初校出来后,方正兄每周细读一章,校样上随处可见方正兄批阅的文字和勾勾画画的痕迹。大到各章各节的论点,小到文字叙述表达、标点符号使用,方正兄都认真提出具体意见,然后与我们逐章讨论,无疑对提高全书质量大有裨益。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在海外出书前就征求专家和友人意见。可以说,这是一次令人愉快的、难忘的经验。

金观涛 刘青峰

1993年8月20日于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导言：寻找历史之路

只要从睡梦中醒来，
黑夜本身是不足畏惧的。

《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是我们研究中国社会宏观结构的第二本著作，它是《兴盛与危机》的续篇。在这本书中，我们试图以一种新观点来诠释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提出超稳定系统在对外开放条件下的行为模式。在论述正文之前，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如何写这本书，也许是有意义的。

1. 大时代的历史感

青年时读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的书，最难忘的是他写《历史研究》的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汤因比乘东方快车自伊斯坦堡一路西行，巴尔干半岛上古远缥缈的高山平野，使他想起昔日文明的光荣与血腥，一种奇异而壮丽的历史感在心中涌起。他感到“一战”的欧洲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写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时代的类似。他把自己的构思写在一页纸上，从此一生就为实现青年时代打下的提纲而奋斗。当时说什么也想不到，类似的故事居然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青年时代的探索，由自然科学涉足于人文历史领域，我们为自己的历史研究也付出了代价，但我们一直没有放弃探索，对近现代史进行思考，所有这一切也都起源

于青年时代的历史感。

所谓历史感,是指人突然对自己生活的时代有所领悟,把人类今天碰到的种种问题和数千年来我们祖先生活的社会联系起来,从而产生一种企图超越某一个特定时代、某一种特定文化社会规范来考察历史的意识。它往往出现在社会或思潮发生重大转向的历史关头。我们对中国历史的思考最早开始于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这种企图重新审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走过道路的历史意识萌发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并不是偶然的。今天,几乎没有人会否认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现象之一是全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兴起和终结。只要追溯1989年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解体的历史因果链,就会发现中国的十年改革也是这一制度内部出现巨大自我断裂张力的重要根源。而中国1979年后的改革开放正好是“文革”摧毁了乌托邦的后果。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实践的转折点。在这种转折关头所激发出的思考无疑有着特殊意义,何况这么多年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海外人文历史学家很难具备的特殊视角。

60年代中期,社会批判意识有两个基本角度:一方面来自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胜负难分的拉锯战,它们各自用自己的价值体系来批判对方,形成五花八门的理论;另一方面是青年人的普遍反叛,新一代以自己特有的敏感和热忱向权威提出挑战,对一切现存制度的合理性进行再思考。而我们恰逢这两股潮流的奇特交汇点,既感受并经历过红卫兵运动的狂热,又为席卷整个西方的愤怒青年之反抗而激动。但是和西方青年不同,我们是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下长大的,了解这一政治文化巨灵内部的五脏六腑。当文化革命中乌托邦幻灭,那些被掩盖着的社会问题向敏感青年显现时,我们突然被一种重大的历史意识所震撼,这就是发现了统治的意识形态与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某种传承。

也许,很多老一辈的人早已察觉到这一点,1949年共产党进

城，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将其当作一个新王朝看待。我们和老一辈不同，深知社会主义本是批判资本主义、企图超越资本主义的产物。无论是封建专制，还是产生这种专制的文化、经济土壤，都是共产党人力图摧毁的东西。但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反传统却造就了一个做梦都没有想到的后果——就在他们以为彻底砸烂旧社会并在它上面建立了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之时，却无法摆脱封建社会影响下的封建专制。固然，马克思主义者可以据此认为马克思主义从未真正实行，现有的社会主义是假的，而自由主义也可以因此宣布马克思主义的虚妄。但我们认为，这一过程本身的意义远超出这两种价值判断之外。它恰好表明在中国一百多年社会改造的历程中，制约着中国社会变迁的深层结构没有被真正意识到，结果是历史好像在跟人开玩笑：本来想走进这一个房间，却发现走进另一个房间。从世界范围看来，社会主义实践无疑是人类第一次有意识地干预社会演化，它的奇特后果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看都是全新的。当时，我们刚二十岁出头，历史感的涌现改变了往后的人生道路。我们放弃了自然科学的研究，决心转向社会科学。我们隐隐感到，这个问题的探索也许要用一生的努力才能实现，它是向一个未知的庞大怪兽作战。当时中国是最封闭的，几乎看不到国外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我们是从自然科学中吸取方法的。这就是把控制论、系统论引进历史研究。

我们发现，从秦汉帝国建立一直到今天，中国社会深层组织方式一直没有改变，这就是社会的整合建立在人们对某种统一意识形态的认同之上，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与社会组织一体化。正是这种组织方式造成社会主义和封建专制的类似性。当时我们把这种思考写成一份六七万字由三部分组成的提纲。第一部分是中国传统社会组织方式研究，它包括在研究方法上批判经济决定论，引进系统演化方法来建立社会变迁模型。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组织方式是儒家意识形态与社会政治组织的一体化，就造成社会演化

呈现出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类型。在这种社会结构中,新结构难以在旧组织中成长壮大,旧社会结构瓦解后又会再次修复,社会演化呈一种奇特的动态停滞,我们称其为超稳定系统。这种组织方式造就了中国古代盛大辉煌持久的文明,但社会进步积累又为周期性大动乱所中断。当西方进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时,中国也就从先进转化为落后。超稳定系统假说解释了中国封建社会在相对与世隔绝条件下长期延续的原因。

第二部分内容是研究超稳定系统受到西方文明冲击后的行为,它应该包括用超稳定系统理论对1840年至今天的中国近现代史重新进行诠释。当时,我们虽然明确地意识到,1949年中国建立的社会是毛泽东思想和社会组织的一体化,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关系上与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同构,但我们当时的学识不可能了解,传统一体化解体后,中国为何还是会最终建立这样一种结构。不过我们却十分强烈地感受到,正因为在今日的社会结构中意识形态和政治一体化的组织方式未曾改变,当中国共产党人用这种组织方式来实现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理想时,却仍然在封建专制主义中运行传统。

当时,我们还用这种社会组织方式来探讨文化革命的原因和它带来的后果,它是研究提纲的第三部分。三部分中第一部分最为详细,它后来成为《兴盛与危机》一书内容的基本思想。70年代中期,我们在河南郑州大学任教,从那个时候起就开始广泛收集材料,与来访的朋友讨论,为今后实现这一提纲做准备。

2. 逃避近现代史

人在青年时代所抱的理想,如同一个向四面八方涌射之源泉,任何一个方向之水源都可能会转化为汹涌的激流。但是当你选择了某一个方向,也许一辈子就跟着这一方向的激流走。如果不是有巨大的意外事变,往往再也不可能回到原有起点,去展开青年时代梦想的另一部分。我们的研究提纲也是如此。1979至1989这

十年，中国大陆推行改革开放，出现了1949年后从未有过的思想文化发展的好气候。我们研究提纲的第一部分获得了充分展开。1980年，我们发表了论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论文，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1981年，我们进一步把论文扩充成专著，《兴盛与危机》一书于1984年在湖南出版。1987年，我们结束一年美国访问归来，开始对《兴盛与危机》作全面修订。我们吸收了近十年学术界的研究成果，验证和细化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假说，以对海内外各种批评作出回答。（《兴盛与危机》的修订本，拖至1992年才改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进一步锤炼方法论之剑，把来自控制论、系统论、突变理论中的内容和社会科学历史结合，转化为我们自己在运用中不断成熟的新分析工具。

1979年到1989年这十年的生活紧张而忙碌。我们出了一本又一本书，与朋友们一起开创了《走向未来》丛书等民间文化事业。光阴飞逝，正如诗人所说“活得匆忙，来不及感受”。中年人的忙碌和沉醉于忙碌带来的成功感，实际上和吸大麻差不多，用占满每天时间来逃避人生的空虚，使他忘却那个青年时代立志一生去追求的理想。正如孙行者画地为牢不让唐僧离开以免受外界伤害一样，当时我们所有探索都有一个不曾逾越的限制，这就是闭口不谈近现代社会变迁。事实上，无论是我们在哲学方法论上的创新，还是历史文化探索，都只是青年时代拟下提纲第一部分之细化。而青年时代历史感的主体，却是对中国现代社会和传统的类似性的体悟，近现代史应比传统社会分析更为重要。可以说，我们是为了解决近现代社会变迁之谜才去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攻其坚必先利其器，我们却整整十年沉醉在磨剑之中，好像造剑本身就是目的。实际上，这是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逃避。

这种逃避来自中年人特有的以成熟和坚强为掩饰的懦弱。青年人在追求真理时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中年人却由于深知前人之专业研究，了解这潭水有多深，就固守“不知深浅，切勿涉

水”的信条。我们知道,无论从材料上,还是问题的复杂性上,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的研究都远比传统社会更难,这是一个更为庞大的领域。任何一个仅仅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学家是不可以凭主观想象和直观外推来理解近现代的。我们在已开辟的领域中比较容易取得成果,但转到近现代史,就可能被史料淹没而一无所获。而且,我们提出超稳定假说已几次被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中国近现代史涉及的问题在政治上远比古代史敏感,即使写出书来,也难以出版。

青年时代的历史感犹如初恋时对爱情的向往,它虽被中年繁忙的应酬和社会责任而造成的心灵麻木所压抑,但有时仍会如大鹏般突然振翅欲飞,在被专业和理性禁锢的铁笼中,带来阵阵不安和骚动。直到某一个重大转折的来临,往日努力的成果和瓶瓶罐罐被意外事变打碎,在十几年耕耘中自己筑下的所有藩篱均被重大历史事变拆除,青年时代的目标才会再次在生命和真理的追求中凸显出来。这一天终于到来了,这就是1989年4月以来我们长居香港之后,像青年时代那样听从历史感的召唤,再次进入新的探索领域。

3. 孤独者的回应

1989年4月初我们应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邀请,作五个月的学术访问。正在这段时间,中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在香港留了下来。当代学者常用“内在流亡”来比喻现代人内心的孤寂。在现代,人与人之间心灵的距离虽已被喻为如一个星球和另一个星球那么遥远。流亡是把一个人彻底和他原有的社会角色相孤立的过程。中年人惨淡经营十几年的文化事业毁于一旦,多年共事的朋友群消失了,他甚至不能照顾年迈的父母,不能再对儿女负起应有的教育责任。在原有的社会角色粉碎之后,一种类似于麻痹症般的无力感开始不断扩展。本来,我们正努力推动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是文化思潮的理性反思者,而在此之后,激烈的简

单化情绪代替了理性，批判意识被用道德为旗号的指责败坏，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一度退回到冷战时期。作家失去了读者，理论家失去了预设的论辩和说服对象。新文化的创造再次被政治干预和社会关切的变化所中断。流亡者的镜中形象不再是一个社会历史和文化积累中的自我，而是赤裸裸孤立的灵魂和躯壳，原来生活的社会赋予人身上的种种意义不再存在。萨特(Jean Paul Sartre)说，我写作故我存在。加缪(Albert Camus)说，我反叛，故我存在。对于我们这一代人，中华民族历史的苦难犹如苍天一样笼罩着我们的青春、生命和思想，从青年时代起，就意识到我们是为着中华民族未来的命运而存在的。但是现在我们还能为祖国做什么呢？

香港中文大学位于八仙岭之南，往北只要翻过两重山峰就是中国大陆。我们常常站在阳台上，面对北方群山，看着太阳徐徐下山，身后华灯亮起，一个灯火辉煌的现代化都市和黑压压的北方构成明显对照。我们在孤独中痛苦地沉思，思考常被九广铁路上轰响疾驶而过的火车中断。是的，对于孤独的思考者、立志把祖国的未来当作自己命运的中国人，我们既无政治权力，又无经济实力，除了已被社会冷漠的文化学术研究外，我们什么也不会做，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又能做什么呢？

中国也许真的又到了一切理论研究、任何文化创造都是多余的时代，社会正在黑暗中酝酿着改变它的各种新动力。然而在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乏各式各样推动力。问题的关键在于，大多数新的动力出现时，它们往往是盲目的。我们的祖父辈不正是被它们推着走的吗？到了我们的父辈，力的方向改变了，他们又被改变了的力推着走。80年代，我们对父辈创造的精神果实和社会体制进行反省之时，却发现自己站到了类似于我们祖父辈的立场。一代又一代人成了历史重复和轮回的工具。在巨大的历史悲剧面前，愤怒开始平息，偏激之情也随着时光流逝变得淡漠，热情却依然留在我们心中。一种把中国今天悲剧般命运和历史遭遇联系起

来的思考日益强烈,我们心中再一次涌现出历史意识。正如历史不能对11亿人无动于衷一样,理论家也不能对自己民族在150年中付出的代价无动于衷。尊重历史最好的办法是去大无畏研究她。我们再一次翻开青年时代的提纲,阅读二十年前的文字,在种种不成熟的观点和错误的史料背后,居然发现那些曾经激动过我们但后来却认定是幼稚的东西仍然正确,心灵再次被青年时代的历史感所震撼。

我们为十几年来下意识逃避近现代史研究感到羞愧,决心着手写《兴盛与危机》的续篇,探索自1840年超稳定系统对外开放后的社会结构的演变。思想家有自己的战场,那就是去战胜(认识)那些人们创造出来但又难以驯服的观念。在社会巨变中,有多少观念如过眼烟云被人遗忘,又有多少观念被历史积淀形变,上百年来它们吸收着民族血汗和精华,成长为庞然大物,使每一个后继者都生活在它的阴影之中,视它们为理所当然。理论家与错误的历史观、不公正的偏见,以及控制着人们的意识形态之战犹如解除魔咒,为了让理性之光照亮观念的群山,就应使它们恢复人创造历史时的本来面目。这种战斗在本性上是孤独的,有无读者和观众多寡对战斗者没有影响。在80年代文化热时期,理论探讨如罗马角斗士进入斗兽场,在社会众目睽睽之下进行,新观念一提出就立即得到观众响应,即使思想苦斗毫无结果,参与者仍能从过程本身得到满足而毫无怨言。但是在绝大多数场合,思想探索不是一项可以忘情于人群的公共活动,思想家必须习惯于孤独的战斗,这是他唯一能对社会挑战所做出的响应。

4. 涌现“历史记忆”

当我们沉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时,才开始理解为何这一领域的突破如此困难。我们碰到的第一个障碍是:中国150年来的社会变迁被人为地割裂成互不相关的几段。青年时代,读毛泽东词《念奴娇·昆仑》,最不解的是诗人因环球大同理想,用倚天宝剑把